

五四运动

杨盛清 陈文斌



1.1

五 四 运 动

杨盛清 陈文斌

广东人民出版社

五 四 运 动

杨盛清 陈文斌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5印张 2插图 7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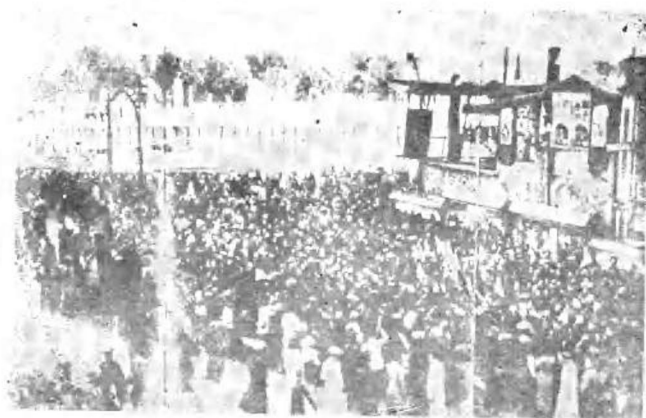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书号11111·40 定价0.3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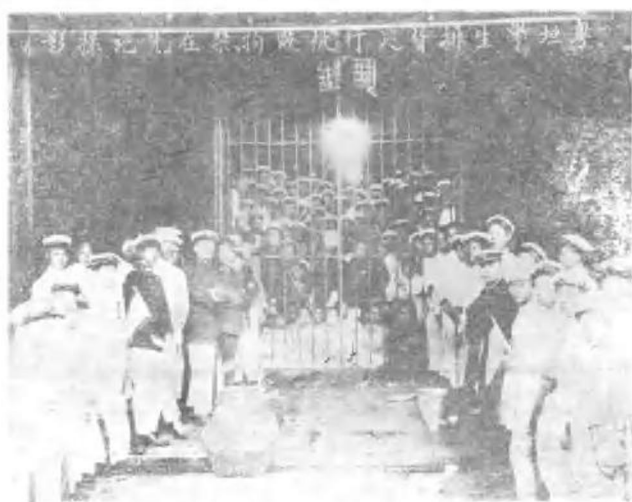
北京爱国青年的游行队伍。



1919年10月15日，天津爱国青年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包围了警察厅，抗议反动当局对爱国运动的迫害。



上海各界人民举行大会。



广州爱国青年宣传抵制日货，遭反动当局殴打并拘捕于先施公司。图为被囚学生和慰问者合影。



中国革命的先驱
李大钊同志。



五四时代的
毛泽东同志。



五四时代的周恩来同志。



1919年秋，“觉悟社”于天津成立。图为该社社员合影。后排左起第一人为周恩来同志；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邓颖超同志。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社会	2
一、“国家坏到了极处”	2
二、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	8
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7
四、黑夜中的曙光	28
第二章 震撼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	35
一、山东问题和巴黎和会	35
二、从五四示威到六三运动	40
三、五四爱国运动的新阶段	46
四、五四风暴席卷全国	53
第三章 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	64
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64
二、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批判	74
三、对假社会主义的批判	80
四、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88
第四章 伟大的历史意义	99

前 言

五四运动是震撼中外的爱国运动，也是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

五四运动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五四”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祖国的独立、民主、自由、富强，为人民的解放、幸福，为科学的胜利、真理的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面对着侵略者、压迫者的刺刀、水龙、监狱和镣铐；面对着政客、文痞、假道学、伪君子的狡诈、诡谲；面对着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投身于工农大众的火热斗争之中，勇猛战斗，坚贞不屈，他们所树立的这种“五四”精神，对今天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战士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是巨大的力量源泉。我们怀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度崇敬的心情，抱着学习和宣传“五四”光荣传统的态度，写成这本小册子，以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由于我们学识不足，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这本小册子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尚望读者不吝赐教。

编 著 者

第一章 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社会

一、“国家坏到了极处”

二十世纪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期。一九一一年十月，爆发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共和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这次革命只赶走了一个皇帝，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地被阴险狡猾、凶暴残忍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一伙吸吮人民血汗、祸害国家的大小军阀们所篡夺。中国人民从辛亥革命中看到的一线光芒，转瞬即逝。神州大地仍旧笼罩在茫茫黑夜之中。

袁世凯一上台，就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加紧建立专制独裁统治。一九一三年，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立即演出了一场选举大总统的丑剧。他下令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炮制了一个适合他搞独裁专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把辛亥革命在形式上取得的一点点民主也全部埋葬掉。中华民国成为虚有其表的一块空

招牌。

袁世凯为了进一步登上皇帝的宝座，百般地向帝国主义献媚讨好。他公然发表声明：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必应恪守”，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的侵略特权“切实承认”^①。一九一四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夺取德国在我国山东侵占的权利，派兵在山东半岛登陆，袁世凯政府和日俄战争时的清政府一样，竟宣布“局外中立”，并划出战区，供日军作战。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又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几乎把国家的主权全部出卖掉。除此而外，袁世凯还先后同俄、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一百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大借外债，拍卖税收、铁路、矿山和领土主权。

在作了这些准备之后，一九一五年下半年，袁世凯公开演出“洪宪帝制”的丑剧，脱掉大总统的礼服，披上皇帝的龙袍。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就在人民革命斗争的怒潮中被迫取消帝制；袁世凯本人也在全国人民一片喊打声和唾骂声中忧愤地死去。

袁世凯倒台后，军政大权落在大军阀段祺瑞手中。段祺瑞也是帝国主义的一只忠顺走狗，主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扩张它的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则利用黎元洪、冯国璋作为它的工具。段祺瑞和冯国璋原本是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袁世凯死后就分裂为两大派系：皖系（段祺瑞）和直系（冯国璋），两派各为扩大

① 《袁大总统文牍类编》第8—10页。

势力、争夺地盘而进行着战争。参加这场争夺战的，还有控制整个东北地区的大军阀张作霖，云南军阀唐继尧，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陆荣廷，盘踞山西的阎锡山以及其他大大小小军阀势力，形成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这些军阀在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方面同袁世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大借外债，购买军火，充实军事实力。仅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西原借款”一项，据估计就有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向日借款总数则达五亿日元以上。作为这些借款的代价是中国东北的铁路、金矿、森林，华北的济顺、高徐二路的建筑经营权，青岛和胶济铁路的驻兵权和管理权，以及全国的有线电信和无线电信的建设管理权等。一九一八年，段祺瑞又和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把中国军队完全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其他军阀也同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借款。

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紧。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美帝国主义乘欧洲各帝国主义忙于在欧洲作战，放松对中国侵略的机会，进一步把它们的势力伸向中国。

一九一四年，日本出兵占领我国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规定：（一）承认日本享有原德国在山东侵占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二）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和南满、安奉（丹东至沈阳）两铁路期限为九十九年，并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及内蒙东部的特权；

（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未经公司同意，不准他人开采；（四）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五）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之铁路建筑权给与日本，允许日本在福建省享有投资修铁路及开矿的优先权。日本通过“二十一条”，攫取中国许多政治、经济、军事特权，实际上把中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

美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在袁世凯称帝以后，美国即以振兴实业、修筑铁路等名目借给袁世凯三千三百万元。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国卷入大战后，由于无暇与日本在中国展开竞争，又与日本暂时妥协，签订共同宰割中国的日、美《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认美国的“机会均等”原则。

辛亥革命后，沙俄和英国乘清政府混乱之际，对我国的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了疯狂的侵略。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满洲里界约》，割去我国满洲里附近一千四百平方公里领土。同年十一月，沙俄支持外蒙古地区的亲俄王公公开叛变祖国，赶走驻库伦的清朝官吏，宣布“独立”。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三日，俄国专使与蒙古王公签订了《俄蒙协约》和《俄蒙商务专条》，十二月又签订《俄蒙开矿合同》。这些协约、专条和合同，使外蒙古所有政治、经济大权及外蒙古的经济资源全部落入俄人掌握之中，外蒙只得到一个“自治”的空名，实际上变成沙俄的殖民地。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五日，袁世凯同意沙

俄的要求，在北京签署了《中俄声明》，完全承认了《俄蒙协约》。同年，沙俄还用武力非法强占了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宣布唐努乌梁海为俄国领土。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六日，沙俄又要挟中国签订了《呼伦贝尔协约》，把中国黑龙江省的一部分，划为“特别区”，实行“自治”，沙俄从中获得了许多特权。在新疆地区，一九一二年夏，沙俄借口“策勒村事件”^①，派兵侵入我南疆喀什城和北疆阿尔泰地区。

英帝国主义长期觊觎我国领土西藏。辛亥革命前后，英帝国主义支持西藏达赖喇嘛背离祖国，发动叛乱，宣布“西藏独立”，并直接派兵侵入拉萨，阻止中国军队进驻西藏。这些侵略活动被中国人民粉碎后，又在一九一三年召开“西姆拉会议”，妄图强迫中国接受他们吞并西藏的计划，使西藏地方的“独立”合法化。中国代表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勾结西藏叛匪在德里地方，背着中国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捏造了一条所谓划定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把中国西藏东南部九万平方公里的一块领土划入印度的版图。

在军阀割据混战和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掠夺的情况下，我们的“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②。军阀们利用权势，非法侵占、剥夺农民土地，造成

① 策勒村是新疆和田县的一个大镇。沙俄侵略者勾结当地一小撮民族败类，经常为非作歹。一九一二年夏，该地群众将沙俄侵略者包围起来，打死罪大恶极分子二十多人。

② 《〈湘江评论〉发刊词》，1919年7月17日。

土地日益集中。袁世凯在河南彰德占有了这个县土地的三分之一，再加上在附近汲县、辉县占有的田产，共有四万亩左右。冯国璋在苏北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占地达七十万亩。张作霖在东北占地达一百五十万亩。帝国主义者也以各种方式在中国占有土地。他们在铁路沿线，在租借地内任意征购土地。如日本强占青岛后，借武力强迫收买土地，到一九二一年数年内，达五百三十多万亩。他们还勾结买办势力，以兴办企业为名，到处盗买土地。随着土地集中，自耕农日渐减少，佃农日益增多。以江苏昆县为例，一九〇五年自耕农占26%，佃农占57.4%；一九一四年自耕农降到11.7%，佃农上升到71.7%。

军阀拥兵自重，无限制地扩充自己的军队，因而军费支出空前增加。一九一〇年清政府军费开支为一亿零二百万元。北洋军阀政府时，一九一六年为一亿五千三百万元，一九一八年为二亿零三百万元，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这些庞大的军费开支，全都落在人民头上。除举外债然后转嫁给中国人民外，北洋军阀政府还采取发行内债等方式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内债数目历年增加，一九一二年为六百二十四万八千四百六十元，一九一九年，则增至二千八百三十五万八千七百元。军阀政府和各地方军阀还任意铸造硬币和滥发纸币，搜刮人民。军阀时期的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无孔不入，从军事特别捐到人头税，有加无已。据统计，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九年，田赋增加了七倍，盐税增加了三倍，烟酒税增加了三倍，印花税增加了六倍，而且军阀任意预征捐税，有的地方竟预征了几十年的田赋。

军阀混战，直接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军队所过，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强拉壮丁，造成生产力的直接破坏。如一九一八年四、五月间，张敬尧率领的北军与程潜、赵恒惕率领的南军混战于湖南。湖南醴陵一带经过南北两军劫掠烧杀，损失极重。

这时的广东，和其它地区一样，也是军阀争夺，连年战争不休，人民困苦不堪。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龙济光自广西梧州东下，占领广州，任广东督军。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桂系军阀陆荣廷率陈炯明、谭浩明、莫荣新赶走龙济光，又任广东督军。在广东，除龙军、桂军外，还有滇军和地方军。这些军阀都是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如一九一八年初，“桂军逐龙军于阳春、电白时，凡城市村落洗劫一空，强奸妇女不分老少，多有羞愤自尽者。及进兵琼岛，淫掠尤甚，商场之损失二百余万，妇女轮奸毙命者数百名……。”^①

总之，五四前夕，中国社会千孔百疮，国势日衰，列强日逼，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各种社会矛盾都在发展着和激化着，一场革命大风暴势不可免。

二、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

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中国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并未能阻挡住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就在这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

^① 《广东惨史》第4页。

时代里，新的社会力量在生长和发展着，一场革命风暴在酝酿着。

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虽然被袁世凯等一小撮祸国殃民的军阀所篡夺，但这次革命终究推倒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在经济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有利的因素。在革命洪流的激荡下，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更加强烈，发展实业受到重视。他们说：过去“专制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达”，“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①因此，辛亥革命后各种反映兴办工业要求的实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筹办工厂之风兴盛一时。如湖南长沙“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②

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即一九一四年爆发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大战一开始，侵略中国的几个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德、法都卷入战争的漩涡。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入战时轨道，民用品生产减少，大批青壮年走上战场，国内生产遭到破坏，国际交通阻梗。这就使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暂时放松对中国的侵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入口商船吨数和各国输华货物总值明显地减少。如以大战前一年，即一九一三年中国出入口商船吨数的指数为一百，那

①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862页。

② 同上，第849页。